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创伤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

张连红　经盛鸿　陈　虹等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伤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 / 张连红等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南京大屠杀）
ISBN 7-81101-242-1/K·27

Ⅰ. **创**… Ⅱ. ①**张**… Ⅲ. **南京大屠杀-研究** Ⅳ.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945 **号**

书　　名　创伤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
作　　者　张连红　经盛鸿　陈　虹等
责任编辑　王　瑾　徐　蕾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 **（传真）**　83598412 **（营销部）**　83598297 **（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89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1101-242-1/K·27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Contents

目 录

代 前 言 记忆创伤的历史——重读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1

第一部分 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张连红/3
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
张连红/20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张连红/36
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
张连红/46
恐惧与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心路历程
许书宏/63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外侨对日本人的态度
彭 剑/102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魏特琳
经盛鸿、沈岚/113
魏特琳与《魏特琳日记》
张连红/126
侵华日军对南京“文化大屠杀”述论
经盛鸿/131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
经盛鸿、开云/145

Contents

第二部分 日军性暴力与南京 1644 细菌部队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与研究
经盛鸿/159

南京利济巷 2 号原日军慰安所遗址调查考证
经盛鸿/186

南京下关区侵华日军慰安所的调查报告
张连红、李广廉/197

侵华日军在金女大的性暴行
张连红/204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生化武器试验及其战争实施
经盛鸿/212

侵华日军南京 1644 细菌部队与 731 部队之关系
张连红/224

南京九华山、浦厂有关南京 1644 细菌部队的调查报告
刘俊虎、朱文镇/234

第三部分 抗战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日据时期日伪对南京文艺界的控制与利用
经盛鸿/243

日伪统治时期南京新闻传媒述评
经盛鸿/260

抗战期间纪实文学作品中的日寇暴行
陈　虹/274

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作家群综述
陈　虹/284

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小议《蜕变》、《法西斯细菌》、《岁寒图》
陈　虹/295

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看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
陈　虹/306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暴行的文化分析
郑忠、高萍萍/316

Contents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戏剧运动评述
陈　虹/325
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陈　虹/337
周恩来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界的领导
陈　虹/347
试论大后方抗战文艺界的募捐活动
陈　虹/355
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兴起和失败
王冠保、经盛鸿/362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
经盛鸿/372
略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城市经济环境的恶化
郑　忠/383

第四部分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以谋求“两个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张连红/395
板垣征四郎在华中日占区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
经盛鸿/403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进程与走向
张连红/416
大学生群体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来自对南京高校1000名学生的调查
李浩升、石城/425
中日大学生如何面对中日战争责任
——中日大学生在宁、沪参观访问交流纪实
王艳飞、许书宏/442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新思维论”质疑
张连红/446
邓小平对当代中日关系的论述及其启示
萧永宏/450

后　记/4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记忆创伤的历史

——重读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

2004 年 11 月 9 日,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女士因罹患忧郁症而不幸自杀离世的噩耗传来,令世人震惊、悲哀、惆怅!在张纯如短暂的一生中,她留给我们三部名著(《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传》、《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美国华人:一部叙述史》)及许多专栏文章,其中在 1997 年 10 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更是登上美国畅销书榜达数月之久,西方社会因此了解到发生在 60 年前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段被遗忘甚至被掩盖的人类创伤。但不幸的是,人们对创伤的记忆并未能转化成共同的财富,甚至这种记忆的冲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加剧。

南京大屠杀:人类共有的创伤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悲剧并未能引起全人类的共同关注与思考。张纯如在写《南京大屠杀》之前,她惊讶地发现西方相关著作里很少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南京大屠杀"并不像日本原子弹,或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广为人知。亚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作者说,在美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这则大屠杀事件。如果仔细检阅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人们就会发现,只有少数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大众阅读的简明版或完整版的"二战"史书,几乎没有一本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尽管在美国也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当时美国传教士、记者与军官留下的日记、电影与照片。张纯如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美国作家或是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出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甚至学术论文?

张纯如生前发现的问题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创伤,南京大屠杀不应仅仅是中国人创伤的历史,它应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卢旺达种族大屠

杀等一样，超越时空、突破种族和语言，成为人类共有的创伤。张纯如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的著作让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民众，重新记忆起已经被世界遗忘了的南京大屠杀。

在同一些美国年轻学者交谈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一书力量的巨大，她在让英语世界的民众共有南京大屠杀的创伤方面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在张纯如的大作出版后，仅笔者个人接待的美国年轻学者（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James Reilly、美国纽约大学 Stonebrook 分校国际关系专业的 Steve Schenc 等，当时他们正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就有近 10 名之多；在 2004 年 9 月 18 日北京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数名美国大学生（另有 1 名中学生）在发表演讲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他们是在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之后，产生了研究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纯如的书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美国华人，还影响了欧美主流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曾经戏说，在让英语世界国民愿意去了解南京大屠杀这点上，“我们三个教授（指唐德刚、吴天威和章开沅）也不如一个小姑娘”。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之后说：“也许现在，这些故事再也不会被忘记。”只要人类共同记住南京大屠杀的创伤，我们才有可能不让悲剧重演。

寻求共同记忆的基础：不同视角的史料

由于时空、立场、角色等诸方面的差异，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有时会大相径庭，但是历史事件的真相只有一个。因此，作为史学工作者，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占有不同视角的资料；在对不同史料进行认真考证、比较之后，才能为人们揭开历史的真相；也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前提下，人们也才可能拥有共同的记忆。张纯如深知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声称为了撰写《南京大屠杀》，她将 90% 的精力都用在了搜集资料和研究上。

为了搜集受害者方面的资料，1995 年 7 月，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亲自聆听幸存者的悲惨回忆。在南京学者的帮助下，她走访了许多幸存者，查阅了大量的中国档案资料。而后，张纯如还前往台湾采访了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作为加害者方面的史料与文献，尽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但张纯如还是尽可能地作了大量的引用，如原日军第九师团的师

团长中岛今朝吾、原日本士兵东史郎、富永等人的日记和书信，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包括本多胜一撰写的《通向南京之路》等。

同中日两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相比，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搜集了大量西方人士的文献。在到南京搜集资料之前，张纯如已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工作了数月，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有大量传教士的资料，这些传教士包括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史迈士，金陵女大的魏特琳，还有费奇、米尔斯、威尔逊等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都曾留在南京参加过组织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张纯如在耶鲁查阅了几乎全部传教士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书信和各种文献，这批资料由于主人大多为大学教授，或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有关人士，所留下的资料可信度较高。另外，张纯如还查阅了许多美国国家档案馆刚解密的档案。

在张纯如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发现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拉贝日记》。德国商人拉贝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建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作为日本盟国的纳粹党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拉贝是一位十分关键的证人。新闻记者出身的张纯如，有着极强的职业敏感。当不断接触南京大屠杀史料后，她意识到寻找拉贝可能会有极其重要的收获。于是，她尝试向拉贝家乡汉堡的几位地方史专家求教，同时还给当地媒体写信刊登启事。1996 年 4 月 26 日，张纯如意外收到汉堡城市历史学家马莎·比奇曼的回信，她找到了拉贝的后人，并很快得知拉贝还留下了一本极具价值的《拉贝日记》。1996 年 12 月，在张纯如和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会员邵子平等人的努力下，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向世人公布了《拉贝日记》。《拉贝日记》成为张纯如撰写《南京大屠杀》最为重要的材料之一。

张纯如女士搜集资料的勤奋与认真是这本历史题材的专著得以畅销的关键之一。仅从《南京大屠杀》一书所引的文献来看，据笔者统计，其直接征引条目近 600 条，而她为此搜集的相关参考资料则是难以计数。但是在当今日本，许多人仍然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他们的视角与思维同战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局一样，仍在刻意隐瞒、篡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构建超越时空与种族的记忆:创伤历史的教训

《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引起轰动的同时,在日本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是,日本媒体的反映却同美国形成巨大反差,赞扬的声音很少。整个日本舆论界几乎充塞了右翼学者连篇累牍的文章,对张纯如的著作大肆挞伐,他们认为张的著作是一部带有政治目的的图书。以篡改大屠杀史料而著称的田中正明认为张的著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反日宣传的书,可以看作是战时宣传的'国际情报战'在60年后的再现"。独协大学的中村粲称此书是"以政治目的而写就的荒唐无稽的书"。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平民死亡人数只有四五十人的上智大学的渡边升一,对张的著作则大肆攻击,他认为张的著作"动机"之一是"美籍支那人"对要求日本战争伤害赔偿的"支那人"的支持和反应。

但是,在潜心读完《南京大屠杀》后,我们却很难将此书同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作者选择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只是将此作为人类野蛮历史的一个案例,通过剖析来探究人类本质的阴暗面,并从中吸取教训。作者在导言中说:"本书毫不掩饰地陈述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残酷与野蛮行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数量上的记录,说明这个事件够资格成为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希望世人从中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作者担心,南京大屠杀这种可怕的不尊重生命的行为,这种人类社会演化的大倒退,会被贬抑为历史的一段小插曲或被视为电脑程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毛病。

正是由于超越了时空与种族的界限,作者的写作目的并不像日本右翼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给日本抹黑,作者的立意是从人性的高度来提出问题,通过解读南京大屠杀这一暴行来探寻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魔鬼?她说:"写作这部书,使得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一切依赖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事实上,作者在后记中十分精辟地总结了南京大屠杀的三大教训:一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纸。"南京大屠杀应被视为一个警讯:说明人类多么容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本性,被塑造成高效率的杀人机器。"二是"把权力全部集中在政府是很危险的——只有未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犯下南京大屠杀这种暴行。政府权力愈不受约束,就愈有可能突发奇想来行事,或是引发政府领导人内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黑暗欲望，向外国发动战争。”第三个也许是最让人痛心的教训是“人类心灵竟能轻松自在地接受大屠杀，使人们在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不为所动。南京大屠杀是当时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但是在屠城展开的时候，世界大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这三大教训应成为人类进行反省的宝贵财富。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带着狭隘、短视的眼光来阅读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我们应该从张纯如女士构建的超越时空与种族的记忆中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①]

张连红

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向南京推进。当时留在南京的 20 余名西方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内发起成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南京安全区。安全区位于外国使领馆和教会学校较为集中的城区中西部[②],占地面积 3. 86 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 1 /8。南京安全区于 1937 年 12 月 8 日对难民正式开放,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 1938 年 2 月 18 日宣布更名后被迫解散。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在 25 万左右,其中有将近 7 万人居住在安全区内的 25 个难民收容所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南京安全区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三篇:孙宅巍的《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南京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刘惠恕的《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学术月刊》1995 年第 8 期)和杨夏鸣的《试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专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中曾辟出篇幅论及安全区的成立及解散[③],洞富雄在其《南京大屠杀》中对南京安全区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④]。但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如:日军在进攻南京之前为何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在攻占南京初期日军为何又要默认南京安全区的存在?日军当局为何后来又要压迫和解散安全区?本文试图根据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对上述几

---

①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② 安全区的地理范围为:东以中山路、中山北路为界,自新街口起,止于山西路口;北以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至西康路之线为界;西以西康路、汉口路西端与上海路同汉中路交叉口之间之直线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

③ 参见[日]笠原十九司著:《南京难民区百日》,岩波书店 1995 年版。

④ 参见[日]洞富雄著,毛良鸿、朱阿根译:《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个问题作一探讨。

日军进攻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

1937 年 11 月中旬，日军将向南京进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贝德士（Bates）、史迈士（Smythe）和米尔士（Mills）等会商应付办法。大家一致决定参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建立一个中立区，以便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使未及时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11 月 17 日，贝德士等 3 人赴美国大使馆商谈成立安全区一事，得到大使佩克（Peck）的赞同。同日晚，在美国大使馆内举行的一个有孙科、张群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参加的宴会上，关于成立安全区的提案也得到大家的赞同。[①] 但是安全区能否成立，还必须得到战争的另一方——日军当局的认可。

11 月 22 日，德国商人拉贝（Rabe）被推选为筹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会议并决定于当天晚上将成立安全区的建议和计划通过上海美国总领事转交给日本大使，呼吁日本当局“迅予考虑答复，俾立即向中国当局接洽，并筹备一切”[②]。24 日，美国大使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将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书交川越大使，“竭诚希望日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尊重安全区，并盼对国际委员会的提议赐予答复”[③]。同一天，南京德国大使馆的罗森（Rosen）为了成立南京安全区之事，也给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发去电报，请他们同东京方面进行联系。[④] 25 日，为了促使日本当局能迅予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曾致电希特勒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到 27 日，由于还没有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又致电在

---

① 参见［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集》，青木书店 1992 年版，第 122～123 页。

② 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5 页。章著中所引安全区成立的建议书是中文原稿，拉贝日记中所载为英文译成的德文稿，可参见中文版《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吴天威辑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见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1 页。

④ 参见［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1937 年 11 月 24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以下简称为《拉贝日记》。

上海的日本驻华大使,“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①。29 日,国际委员会再次给上海日军当局发了一份电报,恳请对安全区建议予以友善考虑,并迫切希望对此建议做出答复。除了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日本当局联系外,29 日晚,国际委员会还通过在上海创设南市难民区的法国神父雅坎诺(Jacpuinot,即饶家驹),希望他能尽快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大使馆副顾问日高联系②,并希望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③。

由于日军向南京逼近的速度异常迅速,因此,南京国际委员会十分迫切希望能得到日军当局的答复,但是日本当局却迟迟不予回复。与此相反,日本的新闻媒体反应倒很及时,但对此多持反对意见。如东京《日日新闻》声称:“如南京成立安全区,则日军之进攻南京,将大受妨碍。南京外侨不足五十人,而所拟之安全区,则毗连炮台与军事工程,日军欲攻击南京而不妨及安全区,乃不可能事。”《读卖新闻》则认为:“南京安全区与上海南市难民区完全不同,此事必须由进攻南京之日军当局决定之。”④

到了 12 月 1 日,法国神父雅坎诺才得到日本政府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电文称:“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⑤尽管日本政府对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收到这一电报后,国际委员会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雅坎诺神父回复了一份电报,希望他同日本当局再次联系,以便使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12 月 3 日,德国使馆从汉口发来的电报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12 月 5 日,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正式答复,对国际委员会关于成立安全区

---

① 《拉贝日记》(1937 年 11 月 27 日)。

② 参见《“南京安全区计划”顿挫》,载《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37 年 12 月 4 日,转自[日]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纂《南京战史资料集Ⅰ》,偕行社 1993 年版,第 643 页。

③ 杭立武:《筹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的经过》,载《传记文学》(台北)第 41 卷第 3 期。见《杭立武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印行,第23~24 页。

④ 《日报意见》,载《申报》1937 年 11 月 26 日。

⑤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2 日)。

的建议再次给予拒绝，其答复较 12 月 1 日的答复除内容更为详细外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如此，国际委员会仍加紧实施安全区的计划，并积极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内撤离。

当日本方面得知国际委员会仍然在积极筹建安全区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 12 月 8 日在一份致挪威总领事和外交使团感兴趣的成员等人传递信息的信件中，再次要求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撤离，宣称所有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①。这一信息同时也通报给了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已十分清楚地表明日军对安全区的拒绝态度。

在日军当局回复的电文中，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主要理由为：“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力，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但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挡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②日军当局上述答复既含糊又明确，其拒绝的理由较为含糊，但其拒绝的结论却十分明确，其拒绝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两点：其一，日军认为作为民间机构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没有能力阻止安全区为中国军队所利用，12 月 6 日《东京日日新闻》对此发表评论也称“完成南京中立地带的设想存在困难，对委员会的实力抱有怀疑”③。其二，日军认为安全区本身也缺少成为中立区的自然条件。他们认为安全区与非安全区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两者之间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而且“南京的地形以及中国军队修建的防御工事已使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堡垒。安全区存在于这样的地区在名称上也是自相矛盾”④。实际上这也是日军当

---

① 陆束屏汇辑编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0 页。以下简称为《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

②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5 日）。

③ 转自［日］东中野修道著，严欣群译：《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内部发行），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 9～10 页。

局为何承认上海南市难民区而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重要原因。[①] 因为上海南市难民区毗邻法租界，其内没有军事设施，且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有一些外国租界负责人参与，其背后有西方列强的背景，日军认为该委员会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立，中国军队不能随便进入。因此，日军认为南市难民区的设置对日军不存在任何威胁，而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则会妨碍日军对南京城的军事进攻。

但是日军又不肯断然拒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提议，声称“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②]。其实日军的这种表态纯粹是一种幌子，因为如果断然加以拒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他们担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实际上，国际委员会也非常清楚日本方面回复电文的背后含义，所以他们不敢对市民的安全做出任何保证。12 月 8 日，国际委员会在市内张贴的《告南京市民书》中非常婉转地道出他们的担忧：“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③]在落款时，国际委员会也特别注意，使用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而不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防止市民会产生误解。

日军攻占南京初期对安全区的默认

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但是，在其进攻南京的过程中以及攻占南京初期，许多事实说明日军对安全区的存在采取了默认态度。

12 月 10 日，日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南京城郊，南京已开始直接受到

---

① 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田中正明认为：日军未正式承认“安全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上海的雅坎诺神甫完全不同，后者采取了公正和中立的态度，而前者一开始就对日军抱有严重的偏见。他认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些反日亲蒋的美、英、德三国人员控制的。”（参见［日］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5～246 页。）但田中正明的这一观点尚未发现有相应的日文资料予以支持。

②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5 日）。

③ 《告南京市民书》（1937 年 12 月 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日军炮火的攻击。11 日,炮击最为激烈,有 9 枚炮弹击中安全区。[①] 日军进城之后,他们攻至安全区附近,在同国际委员会成员接触之后,日军并未攻击安全区,但在安全区附近奔跑的 20 名中国人被日军枪杀。[②] 据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 (Smith) 报道,在安全区里,约有 100 名中国人在日本军队进攻过程中惨死,还有数百人受伤。[③] 不过,同安全区之外的情形相比,安全区无疑显得安全多了。

但进攻南京的日军是否知道安全区的存在呢?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安全区呢?当时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记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

在 13 日日军进城之时,安全区总干事费奇 (Fitch) 在同日军小分队接触时,得知日军已经被告知安全区位置,一名日本军官"取出一张城区地图,在上面指指划划,他指的明显是安全区"。费奇对此感到庆幸,认为"安全区有希望了"[④]。同一天下午,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同拉贝和懂日语的克拉 (Cola) 决定一起去找日军高级军官,在新街口的汉中路,他们"试图向军官解释安全区的概念,并在地图上指给他看,但发现他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他说只要没人向日军射击,医院就会确保无恙,对于缴械的士兵,他却没说什么"[⑤]。拉贝认为他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理解"[⑥]。马吉 (Magge) 在致夫人函中也谈到国际委员会同日军初期接触的

---

① 参见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费奇日记》(1937 年 12 月 13 日),见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0 页。以下简称为《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

③ 参见《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158 ~ 161 页。

④ [美] 乔治·费奇著,郦玉明译:《南京的毁灭》,载《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但是当天费奇的日记却没有记载日军已被告知安全区事 (《费奇日记》1937 年 12 月 13 日,《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第 100 页)。另外,杭立武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及在进入南京的日兵身上,曾发现有被注明安全区的地图,参见《杭立武先生访问录》,第 23 ~ 24 页。

⑤ 《史迈士致家人函》,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第 283 ~ 284 页。

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福井喜代志函》(1937 年 12 月 17 日),见《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16 日)。实际上该信为 16 日所起草,17 日递交给福井。

情况: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同某些日本军官取得了联系,他们说只要医院不藏匿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①] 据魏特琳(Vautrin)的日记记载,安全区委员会委员米尔士对她说,他们目前与日本人的接触还算愉快,尽管接触并非很多。[②] 显然,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同日军的接洽还是比较满意的。

从日军战后公布的战史资料来看,进攻南京的日军是知道南京安全区的。在第10军发布的一份《攻占南京城及入城有关注意事项》中,其第三条为:"严禁接近外国之权益特别是外交机构,对于外交使团提议设立而为我军拒绝之中立地带(笔者注:即安全区),除必要外,应禁止进入,并应在重要地区设立岗哨。"[③]原每日新闻摄影记者佐藤振寿在《随军就是步行》中,有一张当时手绘地图,这幅地图上就标有难民区。[④]

12月14日,史迈士草拟了一封信,并请人翻译成日文,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试图同日军当局取得联系。在日本使馆参赞福田的协助下,国际委员会拉贝、史迈士等人同5名日本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日本军官均表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⑤] 当天,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和克拉在一位"比较正派"而且会讲英语的日军上校的帮助下,去见日军在南京的最高指挥官,也得到同样的答复,他们必须等待几天。[⑥]

第二天,日本海军少尉关口和大使馆参赞福田先后来访问国际委员会,拉贝将14日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当天中午,拉贝、史迈士和施佩林(Sperling)同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和特务机关长官在新街口附近的交通银

---

① 参见《马吉致夫人函》,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190页。

② 参见[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13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为《魏特琳日记》。

③ 《南京战史资料集Ⅰ》,第434页。

④ 参见[日]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纂:《南京战史资料集Ⅱ》,偕行社1993年版,第611页。

⑤ 参见《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6日);《史迈士致家人函》,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285~286页。

⑥ 参见《马吉致夫人函》,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190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